

A Study on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in Thailand

Thoranit LILASETHAKUL & AN Ra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ail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stination countries for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with the number of volunteer teacher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attempting to validate three research hypotheses relevant to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spent in Thailand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training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while taking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s explained variables. The authors measure the degrees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and divide them into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daptation. Reviewing the impac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cross these categories, the authors verify a model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dentify different trends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linked to the different length of time spent in Thailand, and tests whether or not cross-cultural training had an impact on this adaptation. The results are used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action to improve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Keywords: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Empirical study

赴泰漢語志願者跨文化適應研究

林德成 & 安然

華南理工大學

摘要

本文以漢語志願者赴泰時間長短、跨文化培訓等作為解釋變量，以社會文化適應情況和心理適應情況作為被解釋變量，圍繞三個相關跨文化適應假設進行驗證的實證研究。論文主要從漢語志願者社會文化適應程度與心理適應程度之間的關係展開研究，根據兩者的高低組合劃分為四種跨文化適應理論模式；同時通過研究發現漢語志願者的社會文化適應與心理適應狀況隨赴泰時間長短呈現出不同的趨向，以及驗證跨文化培訓對漢語志願者適應情況產生影響的假設；最後提出改善漢語志願者跨文化適應情況的建議。

關鍵詞： 泰國，國際漢語教師中國志願者，跨文化適應，實證研究

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以及與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國際社會對漢語學習的需求正在迅猛增長。為了響應世界對漢語教學的需求，2004年中國教育部開始實施“國際漢語教師中國志願者計劃”，至今已派出近七千名漢語志願者到世界各國從事漢語教學工作。泰國已成為該計劃的重要派出目的地之一，近年來赴泰漢語志願者人數逐年增多。

若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漢語志願者，除了具備綜合素質（指個人修養、知識積累、溝通能力等）與專業素質（指中文水平、外語水平、專業知識和教學實踐能力等）以外，還需要具備較強的獨立能力和適應能力。漢語志願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傳播中國的語言文化。為了能夠以最高效率把漢語傳授給非漢語母語國家的學生，漢語志願者首先要了解學生各個方面的情況，摸清學生的學習習慣，包括他們的學習方法、偏好、心理等，以便選擇較合適的溝通方式及教學方法，以獲得較高效率的教學效果，但是如果漢語志願者自身未能適應異國他鄉的文化，產生了跨文化不適應的心理壓力，很有可能會影響漢語教學效果。

本文調查赴泰漢語志願者跨文化適應程度，分別從他們的社會文化適應程度與心理適應程度兩個維度進行調查。

文獻綜述

有關跨文化社會文化適應及心理適應的綜述

对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之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维度，例如：Mendenhall & Oddou (1985) 认为跨文化适应有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组成成分。Ward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划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Ward, 1992)。Ward及其同事于1992年提出了社会文化适应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文化群体成员进行有效接触的能力。另外，Ward及其同事还提出了心理适应的定义，他们认为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Ward, 1992)。从早期到现在，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同Ward及其同事的观点，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都通过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测量不同研究对象的跨文化适应程度，并将其划分为4种跨文化适应类型：整合型、分离型、同化型和边缘型(Berry, 1997)。

本研究主要参考Ward及其同事对跨文化适应提出的概念，从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维度对赴泰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进行调查。

跨文化適應時段性理論的綜述

1955年，Lysgaard对在美国的200个斯堪地那维亚Fulbright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居住在美国不足6个月和高于18个月的学生之适应性比居住在美国6—18个月的学生适应性好，从而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是个U型曲线模式(Lysgaard, 1955)。1960年，Oberg将该理论的文化适应过程分为4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后来Gullahorn夫妇在1963年根据对5300名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研究他们的回归文化休克问题，研究成果肯定了Lysgaard提出的U型曲线模式，他们总结并提出了W型曲线模型，他们的模型共分为7个阶段：蜜月期、斗争期、纠葛期、适应期、再纠葛期、归国前期以及归国后的冲击。但该曲线理论只单纯描述了旅居者的文化适应过程，并未对文化适应的机制做出说明。

U型曲线模式和W型曲线模式是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的早期经典理论。这两个模式拥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旅居者因居留在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下，遇到了种种不同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文化休克，而使他们的适应程度降低。可见，文化休克对旅居者有很大的影响。至今有不少研究者对文化休克的概念进行解释与分析，近期，中国学者安然认为若要从概念上去辨析，除了从权威词典中找答案，应该也必须仔细揣摩文化休克概念的提出者Oberg的原始意义(安然，2010)。

除了U型和W型曲线模式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者对跨文化适应时段提出了模式，如Mezirow在1991年也提出了跨文化适应过程的10个阶段：面临新环境而产生的困惑；带有负罪或羞耻感的自省；对认识途径、社会文化及精神观念的分析和评价；认识到

不满和变化的过程并非自己所独有，他人也同样经历类似的变化；对新的角色、关系和行为的可能性的探索；计划行动方案；掌握实施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对新角色的临时性承担；在新角色和关系中建立能力和自信；最后在新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重新整合（Mezirow, 1991）。1996年，Ward等人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跨文化适应者体验的生活变化最大，可利用的适应资源最少，这个阶段的适应水平最低。

跨文化培訓的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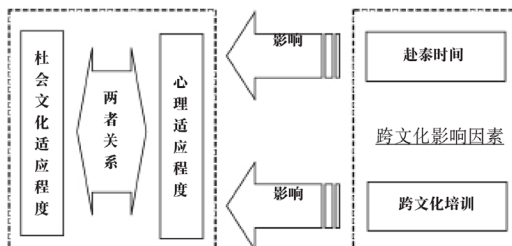
关于跨文化培训的定义，Levy认为跨文化培训是为提高文化自我意识，培训正确的文化行为、反应、技巧以及正确对待他文化而设计的一系列活动(Levy, 1995)。Pusch于1993年总结了各个跨文化培训的3个共同目标：理解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培养与异文化有效沟通的能力；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Pusch, 1993）。Gudykunst, Hammer & Wiseman于1997年认为跨文化培训要丰富被培训者的跨文化知识，训练他们的交际技能，提高他们的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Gudykunst, 1997）。Brislin & Yoshida于1994年提出了跨文化培训的作用，他们认为跨文化培训能够让外籍的人了解文化差异，提供一个特定文化的信息及知识，减少情绪上的挑战（Brislin, 1994）。Black & Mendenhall认为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将协助外国人适应主流文化，提高工作效率（Black, 1990）。

中国学者范征认为有效的跨文化培训能够缩短U型曲线“危险期”的持续时间，减少对个人的冲击程度，从而顺利地过渡到“恢复期”和“适应期”的适应过程（范征，2003）。另外，他还认为跨文化培训的最重要培训项目就是“跨文化沟通技能”。

研究模型与研究設計

研究模型及假設

本研究将以汉语志愿者的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培训等作为解释变量，以社会文化适应情况和心理适应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从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根据两者的高低进行分类，以验证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同时研究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状况随赴泰时间长短呈现出的趋向，以及验证跨文化培训影响汉语志愿者适应情况的假设。研究模型如表图1所示。



图表1：研究模型

關於社會文化適應程度和心理適應程度關係的假設建立.

自从1992年Ward及其同事提出跨文化适应可从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并认为两者存在着至关重要的相关关系之后, 越来越多研究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者都参考他们的想法进行实证研究。虽然, 他们都是从这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但是却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本研究是为了验证赴泰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是否相关。具体假设表述如下:

假设1: 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有相关关系。

關於社會文化適應與心理適應隨赴泰時間增長呈現趨向的假設建立.

时间因素跟跨文化适应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越来越多研究者参考Lysgaard在1955年提出的跨文化适应U型曲线和1960年Oberg提出的跨文化适应的四个过程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 华东师范大学杨军红的博士论文《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 来华时间比较长的留学生(12—16个月)的适应状况反而比来华时间较短的留学生的适应状况差, 甚至越来越不适应。元华及李秀妍的《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将跨文化适应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方面, 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时间一至两年的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尤其是心理适应)程度最低, 抑郁症状相对较重。而在京生活四年以上的韩国留学生基本上都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 并且都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本研究以赴泰汉语志愿者为研究对象, 研究他们赴泰时间长短与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关系, 得出假设如下:

假设2: 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同一趋向。

有關跨文化培訓的假設建立.

志愿者中心要求汉语志愿者出国服务前, 要接受志愿者中心组织的为期两周的业务强化和外事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对外汉语教师的基本素质,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知识(语音、词汇、语法),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方法(备课、课堂组织、练习、测试), 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技术和材料的应用(网络、多媒体、声像), 外事礼仪、相关政策及注意事项, 派往国国情简介及健康保健知识等(国家汉办, 2009)。

由此可见, 志愿者中心培训汉语志愿者的内容里面最重要的培训内容是对外汉语的各种教学技巧, 而派往国国情简介只是培训内容中的一个小部分, 而且培训内容也没有专门为了给汉语志愿者自身加强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训项目, 比如, 如何面对跨文化休克, 跨文化交际技巧等。

本研究将探讨跨文化培训跟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关系，以了解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对跨文化适应情况的改善有无积极作用。因而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有显著差异。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信息，根据统计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及讨论。

樣本選擇与測量

樣本選擇

本研究在样本的选择上，范围限制在由汉办派出的目前在泰国进行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在样本的获取途径上，笔者争取到了一些汉办老师及汉语志愿者的支持，协助笔者向赴泰汉语志愿者收发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形式有纸制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

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参考了相关量表设计出一套初始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此部分共有12个选择题，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的基本情况，题目包括汉语志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讲授课程、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接触的背景、语言能力（英一泰）、对泰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出国前的跨文化培训内容（参考了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基础》所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之维度（陈国明，2007），再加上跨文化休克、泰语及泰国文化等内容）及汉语志愿者对跨文化培训的态度。

第二部分：调查对象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本部分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对当地社会文化适应的情况。本项调查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设计与研究方法综合了元华和李秀妍（2009）《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以及Ward和Kennedy（1999）提供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为了更适合本研究，笔者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改动。

第三部分：调查对象的心理适应状况。本部分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在赴泰期间的心理适应情况。本项调查的心理适应量表设计与研究方法综合了元华和李秀妍（2009）《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以及Zung W.W.K.（1965）提供的自评抑郁量表SDS。为了更适合本研究，笔者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改动。

小樣本調查.

小样本调查的样本是在泰国各地的汉语志愿者中随机选取的。此次调查在2009年11月中、下旬共发出问卷60份，回收问卷52份，回收率达到86.7%，其中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96.2%。

由于本问卷第一部分属于客观可观察的项目，不会发生稳定性问题，故只针对第二部分“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第三部分“心理适应”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通过SPSS16.0测算，“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心理适应”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781和0.798，都超过本文要求的标准（0.7以上），可靠度较高，可认为这两个量表的各个项目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内部一致性较好。

實証研究及討論

大樣本調查

數據收集.

大样本调查同样以目前在泰国任教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为调查对象，并同样是得到汉办老师及汉语志愿者协助收发调查问卷开展调查活动。大样本调查在2009年11月底至2009年12月底期间进行，共发出问卷250份，回收问卷196份，回收率为78.4%，扣除无效问卷13份，有效回收率为93.4%。再次使用SPSS16.0对大样本调查的数据进行测算，得出结果如下：“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量表的信度值分别为0.870和0.798，可靠度较高。

基本數據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下将依据汉语志愿者性别、年龄、学历等的分类基础，将样本的基本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在性别上，据调查所知，在183名汉语志愿者里，男性占19.7%，女性为80.3%，占大多数。在年龄上，年龄在20—25岁间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80.3%，年龄在26—30岁间的占15.9%，31—35岁间的占2.7%，36岁以上的占1.1%。在学历上，在读本科生占0.5%，所占比例最小；本科毕业占74.9%，为绝大多数；在读硕士研究生占15.3%；硕士毕业占9.3%。

在专业背景上，具有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汉语志愿者为较小的部分，占总数的32.8%，而非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占到67.2%，这些专业大体上有汉语言文学、教育学、英语等。据调查结果，需要讲授汉语课程的赴泰汉语志愿者占96.72%，其中有9.29%除了需要讲授汉语课程以外还需要讲授其它专业课程，只有3.28%只讲授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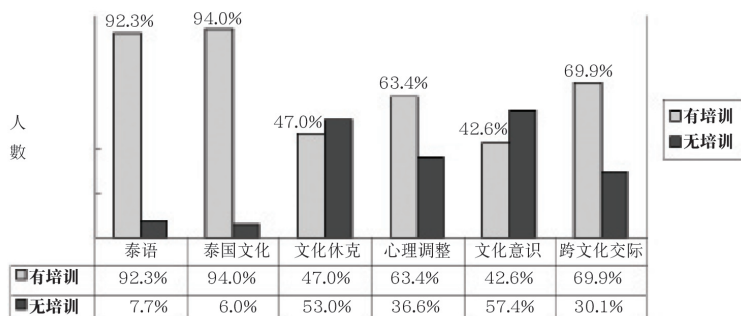
专业课程（例如中国音乐）不讲授基础汉语课程。可得知，有一部分非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汉语志愿者需要给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课程。

74.3%的汉语志愿者赴泰工作时间少于1年，初任的汉语志愿者占了大多数；赴泰工作了1—2年的占21.3%，而工作了2年以上（即留任了2次）的汉语志愿者仅为4.4%。83.6%的汉语志愿者没有出国经历，占了绝大多数；出过国、但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少于3个月的占11.5%，而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多于3个月的汉语志愿者仅为4.9%。

可以用英语进行“自由交流”和“一般性交流”的汉语志愿者分别占43.2%和54.6%，仅有2.2% 存在交流困难，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汉语志愿者的英语能力可以应付日常交流。而汉语志愿者的泰语水平情况则与英语水平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可以用泰语进行“自由交流”和“一般性交流”的汉语志愿者分别占6.0%和52.5%，而认为在泰语使用中存在“交流有困难”和“完全不能交流”的分别占37.1%和4.4%，这说明有大于40%的汉语志愿者存在较严重的泰语交流障碍。

在赴泰任教之前，占1.1%和3.3%的汉语志愿者认为对泰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分别为“完全不了解”和“非常了解”，剩下的29.5%和66.1%则分别选了“不太了解”和“一般了解”。

参加过泰语、泰国文化、心理调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技巧这四项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人数超过一半，其中参加过前两项培训的分别占到92.3%和94.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语志愿者都接受过泰语和泰国文化相关知识的培训。



图表2：有无参加各培训项目分布图

假設檢驗與結果討論

1) 關於社會文化適應程度和心理適應程度關係的假設檢驗

B与C的相关分析		(B)	(C)
(B)	Pearson相关系数	1.000	-.048
	Sig. (2-tailed)		.520

图表3：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用相关分析来检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B)与心理适应程度(C)之间的关系,从相关分析结果整理可知, Sig.(2-tailed) 值为0.520, 大于0.05表明双尾检验不显著,即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假设1的验证结果“不成立”:即汉语志愿者之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没有相关关系。可见,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向不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当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高,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可以同样高,也可以相反。进一步研究汉语志愿者中不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的分组情况,在跨文化适应模式的研究中,以“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两个维度,通过K-Means的聚类分析可得出以下四种跨文化适应模式。

各 集 群 中 心 点				
集群	I	II	III	IV
社会文化适应	3.70	3.80	4.60	4.70
心理适应	3.38	4.30	3.58	4.28
集群个数	9	44	52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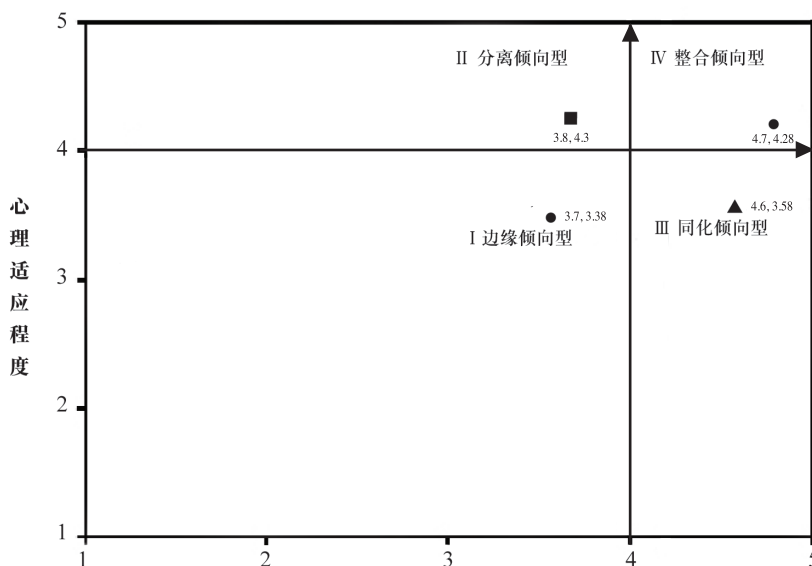
图表4: 跨文化适应模式的聚类分析结果

Berry在1997年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濡化策略,他认为通过考察移民者在异文化环境下保留原有文化的程度和接受新文化的程度,可以把移民者跨文化适应的态度及行为区分为4种: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 J W,1997)。笔者参考Berry的观点,根据赴泰汉语志愿者的实际情况,把根据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来划分的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类型分为4种:整合倾向型、同化倾向型、分离倾向型和边缘倾向型。具体分析如下:

通常以分值“3”作为Likert量表“1分”到“5分”记分法的中心值对问卷数据进行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中心值为(3,3)。然而,经过分析后发现,本研究统计数据的中心值向右上方偏移了一个单位,即为(4,4)。这是由于中泰文化比较相近,汉语志愿者在跨文化适应时要调整的程度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微度的调整而不是大程度的调整,他们遇到的文化差异没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程度大,所以在赴泰期间总体来说在很多方面汉语志愿者都适应得比较好。再加上按照汉语志愿者计划的规定,汉语志愿者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包括住宿、补贴、医疗保险等方面,此外,在生活方面也有孔子学院的中方负责人、带队队长或是各个学校的相关老师进行管理。因此,汉语志愿者赴泰期间的跨文化适应程度都是比较高的。

由上文的数据可绘制出跨文化适应模式图。在图中可看出,以(4,4)为原点,以x=4、y=4为横、纵两轴,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

第一至第四象限分别对应本研究重新命名的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类型之“整合倾向型”、“分离倾向型”、“边缘倾向型”和“同化倾向型”。集群I为低“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70）与低“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38）。若把该群体跟其它3个集群相比，该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算是比较低，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该群体的平均分数并不低于3，也就是适应状况属于“一般”至“好”的范畴，不适合把该群体归到Berry所提出的“边缘化”类型，因此本研究重新将其命名为“边缘倾向型”。该类型的集群个数较少，一共只有9个。集群II为低“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80）与高“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30）的“分离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44个。集群III为高“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60）与低“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58）的“同化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52个。集群IV为高“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70）与高“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28）的“整合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78个，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图表5：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模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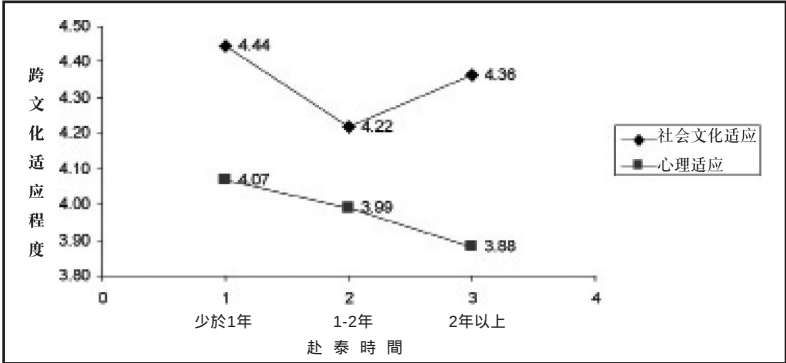
2) 關於社會文化適應與心理適應隨赴泰時間增長呈現趨向的假設檢驗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将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的数据按汉语志愿者赴泰时间长短分为三个组进行统计，如图表6所示。

时间 (t)	少于1年	1—2年	2年以上
社会文化适应 (B)	4.44	4.22	4.36
心理适应 (C)	4.07	3.99	3.88

图表6：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的不同情况

社會文化適應與心理適應隨赴泰的時間散點圖分析



图表7：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情况散点图

我们可以把Lysgaard提出的U型曲线文化适应模式和Oberg对该理论提出的4个适应阶段来解释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情况。首先，汉语志愿者赴泰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蜜月期”。其次，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此阶段看为“危机期”，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汉语志愿者的适应情况恢复良好，我们可以把此阶段看为“恢复期”。笔者在此无法肯定如果有第四个适应阶段，汉语志愿者的适应状况会是如何，但是按照U型曲线的理论，他们的适应程度应该会比第三个阶段好，作为“适应期”。

虽然在第三个阶段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已经恢复良好，但是由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曲线所示，我们得知随着赴泰时间的增长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程度却一年比一年低。在此，笔者用相关分析来检验赴泰时间 (t) 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 (B) 及心理适应程度 (C) 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该因素的变化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及心理适应程度的变化是否相关。经测算，相关分析结果整理如图表8。据表可知，(t) 与 (B) 变量、(B) 与 (C) 变量之间的Sig.(2-tailed)值分别为0.766和0.824，双尾检验不显著，即赴泰时间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假设2得以验证：即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出不同趋向。

t与B、C的相关分析		(t)	(B)	(C)
(t)	Pearson相关系数	1.000	-.359	-.996
	Sig. (2-tailed)		.766	.058
(B)	Pearson相关系数	-.359	1.000	.273
	Sig. (2-tailed)	.766		.824

图表8: 赴泰时间与跨文化适应的相关分析结果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心理适应随赴泰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赴泰时间 (t) 与心理适应程度 (C) 之间的关系, 从而验证随着该因素的变化, 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势呈现何种变化。

Model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B	Std. Error	Beta		
常数项	4.170	.019		222.896	.003
赴泰时间	-.095	.009	-.996	-10.970	.058

图表9: 赴泰时间 (t) 与心理适应程度 (C) 的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上表, 可得出线性方程为 $C = 4.170 - 0.095(t)$

尽管拟合出的方程中 (C) 的Sig. 值较大, 而可决系数为0.992, 大于0.8, 说明该方程的拟合优度甚佳。因此, 仍可以认为该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从方程中可看出心理适应程度 (C) 与赴泰时间 (t) 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随着赴泰时间的增加, 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程度呈现递减趋势。

3) 關於跨文化培訓經歷与跨文化適應狀況差异的假設檢驗.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 通过SPSS的T检验考察有无参加过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与他们跨文化适应程度 (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的平均值) 之间的关系, 可以验证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是否有显著差异。经测算, T检验结果如图表10所示。据表可知, 各项的Sig. 值都大于0.01, 表明方差

检验不显著。换句话说，就是汉语志愿者有无参加过跨文化培训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假设3不成立：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差异不显著。

跨文化培训项目	泰语	泰国文化	文化休克	心理调整	文化意识	跨文化交际
Sig. 值	0. 920	0. 043	0. 645	0. 686	0. 300	0. 031

图表10：跨文化培训各项目T检验分析结果

汉语志愿者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跨文化培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1)跨文化培训师的水平不到位。(2)跨文化培训的时间太短。(3)跨文化培训的内容不完善。(4)跨文化培训的方式不够生动。

研究結論与建議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通过对三个假设的验证，分析了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的四个模式，并探讨了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的趋向，最后研究了跨文化培训对跨文化适应状况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首先用相关分析来验证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双尾检验不显著，表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假设1的验证不成立。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可依“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模式，与Berry在1997年提出的跨文化适应濡化策略基本一致，但本研究的跨文化适应濡化策略类型为“整合倾向型”、“分离倾向型”、“边缘倾向型”和“同化倾向型”。研究发现，本研究统计数据的中心值向右上方偏移了一个单位，四个集群的中心值均大于3，说明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普遍较好。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因为中泰文化比较接近，二是因为汉语志愿者的生活得到了较好保障。

在验证假设2时，从“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情况散点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文化适应曲线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心理适应曲线是一直下降的趋势，两者的发展趋向不同。本研究进一步用相关分析验证了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假设2验证不成立。

在假设3“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有明显差异”的验证中，发现汉语志愿者有无跨文化培训经历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跨文化培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對提高漢語志願者跨文化適應程度的建議

提高對跨文化培訓的認識.

首先，应该有一批对跨文化适应有深刻体悟的培训师。我们认为目前国内的跨文化培训比较看重表象的文化形式差异比较，而缺乏对深层的文化普遍性的深刻理解。对教材教学重视而忽略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对自身跨文化认知水平与能力的调整与提高。

其次，我们认为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但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一种精神的基础上。首先要有一种精神，能力是精神的体现（安然，2007）。汉语志愿者应该意识到对自身跨文化适应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自己的认知空间，而事实上，在自己认知拓展的同时，也丰富了整个社会知识，给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再次，要充分认识到汉语志愿者在跨文化接触中所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策略，采取主动策略的会表现为文化整合和同化的趋势，采取被动策略的会表现为文化边缘和分离状态。跨文化成功人士是具备一些共同点的，如开放的心态、包容的胸怀、整合和独创相融合的思维等。

對志願者選拔環節的建議.

相关部门在选拔汉语志愿者时，应该注重考虑专业背景因素。尽管不能下结论说具有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志愿者比其他专业的汉语志愿者在跨文化适应上表现得更好，但他们在专业学习中涉及的跨文化方面的内容会比其他专业多，这点可以弥补汉语志愿者在出国前跨文化培训时间和内容上的不足。同时，在选拔的过程中严把汉语知识关，这样就方便调整培训方案，不用把近一半的时间、精力投在培训汉语知识上。

對志願者培訓環節的建議.

（1）提高跨文化培训在出国前培训中的比重，并注重培训的实效。（2）注重当地语言及当地文化的培训。（3）增加“知己知彼”的培训内容。在培训的时候应该增加泰国学生的行为和心理特点及作为泰国教师应该具备的行为素质等内容。根据研究结果可见，除了“整合倾向型”以外，大多数汉语志愿者还存在着跨文化适应程度不理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更加关注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尽量提高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程度。

對中方日常管理環節的建議

尽管汉语志愿者是由工作所属学校进行日常的管理，但中方也应该开展更多的日常跟进工作。比如，前三个月每个月进行一次生活、工作等方面适应情况的调查，之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样可以及时掌握各个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情况，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感，可以缓解一些思乡、孤独等情绪。此外，汉办还可以设立一个慰问小组，到各个学校对汉语志愿者的生活进行实地调查，这样可以掌握他们真实的生活及适应情况。

對泰方日常管理環節的建議

中方可以与泰方进行协调，建议泰方在对汉语志愿者的日常管理中，涉及以下内容：帮助志愿者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尽可能让志愿者多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增强归属感；如果有条件可以集中一些汉语志愿者，为他们开设泰语及泰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志愿者进行调查，及时了解他们的需要，关注他们的适应情况。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赴泰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得到了一些启示。本文在第二个假设的验证中发现汉语志愿者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向与早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汉语志愿者心理适应程度呈现递减趋势，虽然笔者认识的一些汉语志愿者曾经向笔者提出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但是此结果还缺少合理的理论来支撑，希望后续研究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

对中国外派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同派往国的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全面地分析外派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小范围的尝试研究，只针对三个假设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为局限，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和思路，还有待更深入、范围更大的研究对本文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及提升，同时相信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 安然. (2010). “文化休克”译释探源. 学术研究, 第3期, 50-54.
- 安然. (2007). 双语教学能力培养模式探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 1-4. 双语教学专刊.
- 范征 & 张灵. (2003). 试论基于动态平衡模式的跨文化培训. 外国经济与管理, 25(5), 25-30.
- 国家汉办. (2009). 目前志愿者教师派出分布一览, 2009年7月16日来自互联网: http://www.confuciusinstitute.net/college/article/2009-07/16/content_16020.htm
- 元华 & 李秀妍. (2009). 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青年研究, 第2期, 84-96.
- 杨军红. (2005).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Berry, John.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 153-168.
- Black, Stewart; Mendenhall, Mark. (1990). Cross-cultural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 review and a theory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5(1), 113-136.
- Brislin, Richard & Yoshida, Tomoko. (1994).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An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Chen, Guo-Ming & Starosta, William. (2007).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Gudykunst, William; Hammer, Mitchell; Wiseman, Richard. (1997). An analysis of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2), 99-110.
- Levy, Jack. (1995). Intercultural training design. *Intercultural Sourcebook; Cross-cultural Training Methods*.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Inc.
- Lysgaard, Sverre. (1955). Adjustment in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7, 58-73.
- Mendenhall, Mark., & Oddou, Gary. (1985). The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ccultu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 (1), 39-47.
- Mezirow, Jack. (1991). *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Oberg, Kalervo, (1960). Culture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Practical Anthropology*, 7, 177-182.
- Pusch, Margaret. (1993). *The chameleon cap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 Ward, Colleen; Kennedy, Antony. (1992). Locus of control, mood disturbance and social difficulty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6(2), 175-194.
- Ward, Colleen; Kennedy, Antony.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659-677.
- Zung, William. (1965).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2, 63-70.